

纪念“留学之父”容闳： 容闳留美教育计划启动 140 周年学术讨论会概述

郭常英 张秀丽

140年前,由容闳发起促成的幼童赴美留学运动,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推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程。2010年11月16~19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市委香洲区人民政府、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念容闳留美教育计划启动140周年暨容闳与留美幼童后裔联谊会”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及70多位幼童后裔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学者以“容闳留美教育”为主题,提交大会的40多篇论文以容闳为中心,对留学生群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学术的创新精神及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本次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晚清留学生是一个群体,他们不是孤立呆板的历史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共同体。他们存在于当时社会之中,与周围的一切发生着互动和联系,他们有喜好、有追求、有情感、有事业,是近代中国首先出洋学习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流砥柱。留美幼童后裔梁赞勋在《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一文中指出,这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被召回国后的一生,是当时求变、思变、投身变革的社会精英的跌宕人生和思想轨迹的有代表性的写照。留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精英的主要发源地;留学生文化,是鸦片战争以来精英文化的重要源泉;留学生的思想起伏和理想追求,在总体上展示了百年以来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心路历程及发展轨迹。南开大学李喜所的《“气场”失调:解读晚清留学生“被边缘”的命运——以容闳、严复为例》一文,从留学生与晚清社会的错位的角度,创新性地指出:晚清留学生多有“气”无“场”,即使像容闳、严复那样的杰出人才,也难以进入当时社会的核心地位,他们总是处于“在野的地位”,孤独地先行。究其原因种种,极其复杂,就其要害,在于“气场失调”,是晚清社会还没有形成接纳和培育留学生为主体

的精英文化的社会场域和文化生态,还没有升华出一个有益于他们施展才华的“气场”,即不是时机。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催生了容闳促动幼童留美的创举,对于幼童留美事业后来的夭折,学界也有不少评论。广东省社科院王杰的《“中体西用”视野下之陈兰彬与容闳关系》一文,从“中体西用”的角度,阐释了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他认为,这并不是“保守派”陈兰彬个体的责任,而是时代思潮、传统体制作用的结果。文章指出,“中体西用”理念的副作用,是导致幼童留学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早期留学运动难以脱离“中体西用”的藩篱,也扼制了留学事业的发展。

香港大学郑宏泰的《论大清留美幼童的人生际遇与社会资本——以周寿辰为例》一文,从分析留美幼童早年相识相知所组成的关系网入手,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他指出,留美幼童之间形成的关系紧密的网络,一方面与他们背景相似、年龄相若及共同的生活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结果。在那个固步自封的年代,当中国正从“天朝上国”逐渐沦为西方的世界的边陲之际,曾经放眼海外、视野开阔的幼童,在当时无数国民看来,他们无疑属于举止洋化的一群异类。他们在世俗的目光或闲言碎语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自觉或半自觉地强化内部凝聚,当同窗书友碰到困难时,大家施以援手、扶上一把,这些实在不难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晚清留美幼童所组成的关系网,其实带有韦伯所指的以语言、种族、祖籍、宗教、血统,甚至专业文凭和资格等为条件,组成社会圈子,从而主导或占据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味道。日本东京大学谷垣真理子的《通过婚姻关系来看的留美幼童——广东关元昌家族个案的启示》一文,分析了留美幼童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

珠海、澳门是中国留学教育史的重要研究区

域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学院赵凤连的《留学教育先驱与珠海历史文化》一文指出,珠海出现了像容闳、徐润、唐廷枢等一批近代留学教育先驱,是与珠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安宇、沈荣国的《明清时期珠澳留学现象刍议》一文指出,珠澳在明清时期的留学教育,是与晚清的留学教育彼此紧密相连、先后相续的整体。

关于留美幼童个案的研究。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因缘际会的杰出人才群体,他们各自怀有远大的抱负和出色的才干,120名留美幼童每一个都是值得研究的个案。在这次会议上,研究留学生个案的文章较多,并且角度新颖,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留学生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情态。南京大学黄鸿钊的《留美学童梁如浩的人生》一文,分析了留学生活对梁如浩的影响及其回国后在中国政坛的表现,表现出梁如浩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爱国者。徐州师范大学周棉的《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的唐绍仪》一文指出,作为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并不是以留学教育家而闻名的,但他润物无声的影响和实际推动,使其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珠海市博物馆肖一亭的《唐绍仪研究现状浅识》一文,对近年来有关唐绍仪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此文对研究现状有所了解。

蔡廷干是在晚清从珠海走向了世界,并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跃的人物。中山大学赵立彬的《清末民初变局中的蔡廷干》一文认为,自幼留学美国的蔡廷干,受到过西方思想和社会风气的熏陶,因而对外部世界有较深的了解。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远的人生抱负,并能够顺应新潮流,但他内心深处也有强烈的受朝廷培育,受当权者个人知遇、提拔的感恩情结。唐国安是第二批官费留美生,他归国后为祖国的留学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唐绍明的《早期清华主要创建人——唐国安校长》一文指出,唐国安见证了清华(学堂)的孕育、诞生、关闭、重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壮大和辉煌,铺上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是晚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赛会活动,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对中国社会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上海图书馆黄薇《困境与无奈:“留美幼童”黄开甲的世博

之旅》一文,通过黄开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多方利益在世博会平台上的角力,以及中美两国间的微妙关系。

黄宽是第一位留学欧洲并获得西医资格的中国人,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张娟的《黄宽留学英国考论》一文,结合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制度,分析了黄宽留学英国期间在校所受教育的真实情况,勾勒出了这位中西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先驱的早年求学生涯。

关于留美幼童史料的挖掘与史料考证 研究历史,史料是最基本的条件。留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留学生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的重要基础。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亮点,是新史料挖掘与考证不断深入,新的重要史料纷纷出现。尤其是幼童后裔提供的家族史料,更是弥足珍贵。如唐国安后裔唐绍明的《唐国安年谱》,尤其是后裔唐越翻译的唐国安的《游美始末与收获》,对促进唐国安的研究大有裨益。主要有黄开甲后裔黄兴的《黄开甲生平事略》,潘斯炽后裔毛观岱的《潘斯炽简历》,钟文耀后裔陈肇基的《钟文耀(1861~1945)生平事略》,唐元湛后裔邓捷的《留美幼童唐元湛》,温秉忠后裔李鸿捷的《“留美幼童”温秉忠》,等等。

对留美幼童家族史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本次会议也有许多有关家族方面的史料文章,如留美幼童欧阳庚后裔欧阳乐的《百年沧桑(庆余坊)——欧阳庆余家族简况》,留美幼童丁崇吉后裔丁志华的《我们这支丁氏家族的史料点滴》、《丁崇吉的后人们》、《介绍丁崇吉的几位后裔》三篇文章,对研究丁崇吉及留美幼童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史料。黄孝全的《追忆祖父黄仲良生平事迹二三事》、黄志航的《黄开甲生平与其家族后裔二三事》,留美幼童沈德耀后裔沈炜明的《先遣家史》等。

在留学生之父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120名留学生之外,还有五位小留学生与他们先后同行。他们一起参加了留美幼童学习的全过程,当清政府召回留学生时,他们又一起回国。徐笏臣后裔乔松都的《留美幼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文,对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史料。

日本亚细亚大学容应莢的《容闳和留美幼童在新英伦的足迹——寻访资料旅行的报告》一

文,对促进留学研究、留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广州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胡文中的《詹天佑史料考证与补遗》一文,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史料考证与补遗,对研究詹天佑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会议加强了学术研讨,促进了容闳与留美幼童后裔的联系和交流,把海内外学者和“幼童”后裔的力量与成果凝聚在了一起。“幼童”后裔与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就留美幼童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加强了留学生相关史料的整理、挖掘工作,从而把留美幼童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纵观本次会议,则呈现出四个新特点:一、学术与联谊相结合。参加会议的既有重量级的学术专家代表,又有留学幼童的后裔,使得会议在突出学术讨论的同时,又与联络友情相结合,这是会议模式的创新;二、史料的推陈出新。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史料的丰富和充实有助于留学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本次会议中,许多代表提交了较多资料性的文章,这成为本次会议的

一大亮点。幼童后裔提供的家谱、家族沿革等内容,除了文字资料之外,还有图片等,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清末留美幼童的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多种学科方法的引进方面。如留学生研究与家庭史、家族史相结合,留学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传统史料研究与口述史的调查研究相结合,这些学科方法的运用和交叉,使得会议在留学研究方面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会议的学术价值;四、严谨的学风在本次会议上有了较充分的体现。专家学者们脚踏实地从史料出发,对史实进行深入研究;幼童后裔积极搜集历史资料,查找历史档案,为自己的先人——留美幼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10—12—06

作者郭常英,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秀丽,周口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 映雪】

(上接 130 页)理,采取了多方面的限制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国民政府在限制教会租地方面颇受束缚,相关政策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力。

印度独立后,原来隐藏在深处的中印矛盾开始凸显,印度的主权意识空前膨胀,在外交上刻意继承英帝国所得的利益及边界,中印之间关于设领问题的交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探讨了1948年中印设领交涉,指出葛伦堡设领由发端到交涉,印度始终未予明确表态支持,而是不断寻找理由与借口,企图借机拖延或回避。

八 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对西方各国的态度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浙江农林大学程珂指出,在1950年接收美、英驻北京兵营地产的活动中,美、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而新中国政府也实施了不同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迅则关注新中国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政治宣传,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了中共政治宣传制度的建立,探讨了运动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诸多美国形象,并

分析其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认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成功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宣传组织和制度,并发动社会各阶层力量,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美国塑造成“战争贩子”、“野兽”、“纸老虎”等一系列丑恶形象,成功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引导到反美运动中去。

美国对华援助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美国军援和经援政策均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继东系统地探讨了1950年后的15年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情形,认为美国对台军援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军援金额大于经援金额;并指出,美台之间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是由于有比较多的利益重合点,美国军援的成效明显。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使台湾当局在军事上获得了与中国大陆隔峡相峙的资本。

收稿日期 2011—03—20

作者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婉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 公羽】